

## 第五章 貧瘠土地裡的播種與深耕——吳瀛濤與台灣文學史

台灣文學發展的過程中，或受政治干涉、或因時勢所趨，甫立下基礎的文學，往往得不到較為健全的發展。以文學史為例，由於政治因素的考量，加以日治時期重要文學作家的陸續缺席，幾乎成爲禁忌的議題，可以供作回顧與參考的史料相當有限，戰後一代的作家對於日治傳統十分陌生。就現代詩而言，一方面由於時代因素，能夠作爲詩的題材有限，一方面由於語言的問題，增添省籍詩人創作的難度，雖有紀弦引進現代主義，帶領詩人繼續寫作，但台灣本地一直沒有詩論的根基，也鮮少詩評的討論。吳瀛濤曾在一九五三年發表「原子詩論」，堪爲戰後台灣最早的詩論，然而，卻未得到文學界的重視，爾後，他發起成立笠詩社，更致力於現代詩論與現代詩評的引介與介紹，並曾在一九五四年發表台灣文學的回顧文章於《台北文物》，可以說是戰後最早的文學史相關篇章，然而，亦未引起文壇的注目。

本章將以吳瀛濤過去長期爲文學史忽略的成就，特別是詩論、詩評與詩史的貢獻爲主加以討論，檢視吳瀛濤如何在有限的資源中，發揮他在日治時期接收到的世界文學思潮的涵養與日治傳統的文學養成，加以長期蒐集資料及致力文學與文化活動的用心，並使之與台灣文學史加以連結，檢視吳瀛濤在台灣文學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影響，標舉他對台灣現代詩與文學史所立下之根基，與投注笠詩社之深耕，使之在台灣文學史上的地位能夠重新獲得定義與評價。

### 第一節 原子詩論的提出及其意義

台灣現代詩的發展由於政治環境的切割，戰後初期是處於無枝可依的狀態。詩壇呈現一片死寂的狀態，本地作家幾乎都還在努力從語言的困境中掙脫。因此，這個時期的詩人作品並不多，如果有，大多數以外省詩人爲主。詩壇尚且如此蕭條，更遑論詩論的產生。一九五三年，紀弦引進現代派，將它移植到台灣的詩壇，發行《現代詩》<sup>1</sup>季刊，並成立現代詩社。台灣的現代詩在傳統的雙重斷裂情形下，從而找到新的方向。一方面從翻譯的詩作中找到寫詩的方法，一方面也藉由譯詩認識西方理論。透過紀弦的努力，台灣詩壇在閉鎖的環境中找到出路，現代詩派因與台灣文學環境有相適之處，因此生根。若仔細考察早期的譯詩，不難發現其中存在諸多謬誤，或由於當時的翻譯水準不夠精當，或由於當時譯詩時對西方詩壇沒有足夠的認識。然而，對於當時不夠成熟的現代詩壇來說，已達

<sup>1</sup> 《現代詩》季刊創刊前，紀弦最先曾創辦《新詩周刊》及《詩誌》。無論前述詩刊或後來的《現代詩》，都表現出紀弦欲將大陸現代詩傳統引自台灣的企圖與決心。

到指路的功效，為台灣的現代詩開闢了一個實驗習作的園地，使歷盡傷痕的詩壇能夠漸漸康復起來。

閱讀一九五三年現代詩社初成立時的刊物，不難發現其中除了譯詩以外，多數為外省作家的作品。若仔細考察，會發現一位本省詩人赫然並列於期間，那便是吳瀛濤。在戰後初期詩壇尚未蓬勃之時，詩社與詩刊並不繁盛，幾乎以紀弦的《現代詩》為主要的刊物。吳瀛濤身為跨越語言一代詩人中最早能夠重新駕馭中文的一員，他在戰後現代詩社成立後，亦立即回到崗位上，同為現代詩的重建盡一己之力。歷經戰火洗禮的吳瀛濤，在戰後重獲發言權以後，便努力嘗試寫作，不斷進行中文練習。在此同時，他也為台灣的詩論默默耕耘著。一九五三年，當他的第一本中文詩集《生活詩集》出版時，他所撰寫的〈原子詩論〉也同時在《現代詩》刊出。因此，「原子詩論」的產生，無論在內容或發表的地方，都具有相當的時代意義，了解他的內涵之前，應對其背景有恰當的認識。

## 一、原子詩論發表之時代背景

回顧戰後的台灣文壇，雖並非全然空白，亦無顯著的成就。戰後初期開出曇花一現的榮景後，便立即因為政治高度警戒的緣故，產生嚴重的斷層，過去曾活躍於文學界的作家，多數陷入沉寂。外省族群作家躍上文壇成為主角，而文藝獎章也成為唯一檢驗藝術成就的標準，純文藝的追求轉而成為次等的要素。及至一九五一年，由紀弦及覃子豪主編的《新詩周刊》<sup>2</sup>發行，為戰後最早出現的第一份詩刊。隔年紀弦再度主編《詩誌》，為戰後現代詩雜誌之濫觴，然由於經濟的因素，僅刊行唯一的一期。儘管如此，仍未熄滅紀弦欲將中國現代詩傳統引自台灣的企圖，一九五三年《現代詩》季刊的創刊，紀弦的現代派火種得以點燃，並為詩壇帶來前所未有的革命。《現代詩》成立之際，紀弦尚未鼓吹現代主義，使之形成一個運動。對照《詩誌》與《現代詩》創刊號的宣言，可以發現他的主張，主要是在「新大陸之開發、處女地之開拓」<sup>3</sup>、「向世界詩壇看齊、學習新的表現方法」<sup>4</sup>然而，備受矚目的現代派運動並非隨著雜誌的創刊而開始，現代派運動及其六大信條，一直要到一九五六年《現代詩》<sup>5</sup>第十二期發刊時，才要開始對

<sup>2</sup> 該刊借《自立晚報》副刊版面創刊，每周一出版，至1953年9月14日休刊，前期由紀弦主編，後期由覃子豪主編，經常在該刊發表的作家有鐘鼎文、鍾雷、方思、李莎、上官予、蓉子、潘壘、楊喚、林亨泰等。

<sup>3</sup> 節自《詩誌》第1號(1952年8月)，〈詩論三題〉中「三、我之詩律」。

<sup>4</sup> 節自《現代詩》創刊號(1953年2月)之「宣言」第五段。

<sup>5</sup> 自一九五六年《現代詩》第12期發刊以後，現代派運動便如火如荼地展開，爾後每期的詩論，幾乎集中於「現代派」宣言的揭示或釋義。如〈現代派信條釋義〉(《現代詩》第13期(1956年春季號)，為該期社論)、〈從形式到方法〉(《現代詩》第14期(1956.4.20)，為該期社論)、〈現代詩的特色〉(紀弦撰，發表於《現代詩》第15期(1956.10.20))、〈關於現代派〉(林亨泰撰，發表於《現代詩》第15期(1956.10.20)等，可以看出他們推動現代派的用心。

詩壇產生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在紀弦所提出的六大信條中，有一項顯得特別突兀，即「第六條：愛國、反共、擁護自由與民主」。回顧《現代詩》創刊號的宣言，亦可發現「反共抗俄」竟是這個詩刊發行的使命之一。可以推知，縱然現代主義運動最早在台灣現代詩開花結果，然而，卻是與反共抗俄口號的並置下而開啓的，雖然後來現代詩也慢慢開出一條獨立的道路，漸漸取代戰鬥文藝的地位。然而，由此不難想像當時「戰鬥文藝」推行的熾烈，與作家受到動員的情形，吳瀛濤的「原子詩論」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當現代派的胎動還依附在「反共抗俄」的掩護下準備出發的同時，便已登上《現代詩》季刊的詩論專欄<sup>6</sup>。此時，關於現代派的詩論皆尚未集中，討論亦不熱烈。對於創作的想法，多半只是零星意見的發表<sup>7</sup>，「原子詩論」在其中顯得格外完整而具體。一直到《現代詩》第十三期刊出〈現代派信條〉之前，「原子詩論」成爲一個突出而優異的存在。紀弦在該期的「編校後記」中，便特別爲吳瀛濤寫了一段推薦辭，並對他的「原子詩論」寄以高度的肯定與期待。文中提到：

本號發表有詩及詩論的是吳瀛濤先生，是本省籍的詩人，在光復前，常以日文寫詩發表於各報刊，光復後始習中文，短短的數年中，即有如此成績，實在令人欽佩。他的詩，具有獨自的風格，無論在形式上或內容方面，都是「現代」的；他的詩論尤具卓見，用特鄭重推薦，並期待著對這一問題的探討之展開。

既然吳瀛濤的詩論先於其他詩論提出，並受到當時現代派運動主將紀弦的認同，何以在現代派運動的過程未獲彰顯，在戰後的文學史上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其內涵與質性如何？是否透露出些許文壇現象之端倪？下段繼續討論。

## 二、原子詩論的內涵

吳瀛濤提出的「原子詩論」，是建立在歷史的鉅觀。他從中、西方的文學源流與當前發展的回顧作爲引言，接著指出二次大戰以後，世界即將進入恐怖的「原子時代」，然而，爲避免再度發生戰爭，人類應該特別留意「原子」所帶來的作用，期使他的建設性能取代挾帶而來的破壞性，對人類產生好的影響。從這一點來看，吳瀛濤具有相當的世界觀，對於文學的掌故及其發展的趨勢，有相當的認

<sup>6</sup> 〈原子詩論〉，發表於《現代詩》第3期(1953.8.20)，這是吳瀛濤第一次於該誌發表作品。除了〈原子詩論〉，尙有〈神像四首〉。

<sup>7</sup> 舉例來說，如《現代詩》第六期(1954.5.20)，〈把熱情放到冰箱裡去吧〉。

識，加以對時代的走向與即將面臨的未來，都有相當足夠的知識。作為一個戰後初期最早出發的本省詩人之一，充分展現了日治知識份子的自覺，也突顯出日治文學傳統所到達的高度，十分值得注意。其三大意涵，分別為：(一)它與最高科學精神相符合、(二)原子與原子詩的同質、(三)它的純粹性自由性。以下分別進行細部討論：

### (一)它與最高科學精神相符合

由於「原子詩論」的理論乃以「原子」為核心發展出來，而原子正是當時科學文明之最高象徵。因此，這個理論本身即具有相當的時代意識與科學精神。對於這個意涵，吳瀛濤曾提出一番解釋：

真正體會此一時代最高精神的詩人，始能創生原子般高貴的詩，原子既係由過去累積的龐大人工與智慧的組合而成，則原子詩的展開與成就遂均待之於過去近代詩各派之取長補短，再加以原子時代的意識去琢磨<sup>8</sup>

這裡所謂的最高科學精神，實與創作過程中的「批評作用」相互呼應。面對原子時代的來臨，詩人應具有高度的知性，能夠對文學的內容進行批評的作用，發揮理性的一面，以達到取長補短的效果。如果將此對照紀弦所提出的「現代派信條」，會發現與其第一條「我們是有所揚棄並發揚光大地包含了自波特萊爾以降一切新興詩派之精神與要素的現代派之一群」有不謀而合之處。就發表時間而言，原子詩論則早於該信條。由此可見吳瀛濤在詩作的想法上與紀弦頗為相近，更重要的是，雖然原子詩論在當時並未引起大量的迴響，今天看來，吳瀛濤作為一個先行者的角色是無庸置疑的。他的想法與後來現代派的主張多有相合之處，加入該集團是必然的結果，而此亦可推知，台灣的現代主義精神已有相當程度的發展，紀弦之所以可以在台灣順利推行運動，除了高壓政治的背景以外，和日治時期已建立基礎的現代主義美學有密切的關係。不過，無論是現代派六大信條或原子詩論，均已具有頗為可觀的時代感與科學精神，這是值得肯定的。

### (二)原子與原子詩的同質

其次，吳瀛濤對於原子與原子詩的性質，提出他的想法，他指出：「原子放

<sup>8</sup> 節自吳瀛濤，〈原子詩論〉，發表於《現代詩》季刊第3期，頁55。後亦收入《生活詩集》。

射力的破壞性與建設性，兩種之中，只有後者才可期待永遠的光輝，則原子的本質應被選擇限為建設力，同樣，原子詩亦應以趨向建設貢獻人類為他的目的」原子時代象徵科學與現代化的高度發展，然而，由此帶來的影響，如同原子爆發的影響力，有正負兩面的極端，其破壞的能力不可小覷。詩人意識到時代的轉變即將對詩歌發生作用，或可嚴重破壞詩本身的質地，或可創發可觀的建設。基於此，吳瀛濤在此揭示應善用原子的建設力，對現代詩產生良善的影響。而此主張正是本詩論的經髓所在，主要的概念均由此為原則出發。為避免破壞力的產生，詩人對於現代詩，提出許多應行的方向與箴言。這些想法，也在他後來的詩評與詩論中一一示現。下面一項即為重要的意見之一。

### (三)它的純粹性自由性

吳瀛濤對於詩的純粹性與自由性的要求，主要是建基於過去詩歌發展的檢討，與當前現代詩所面對的時代環境而生。他指出：

它不是限制，也不是拘束。它確是以最高度最純粹而自由的精神換來的，它是科學家血汗結晶的發現。……。至於詩的方式已無需押韻講格律，而且詩之題材也不論何等污穢何等離奇。只需那原子能般的眼光，從詩人澄清的心目放射出來，渴望新世紀具有信心皎潔的呼吸，從他寬厚的胸膛湧出來<sup>9</sup>

這個想法的提出是建基於時代觀而出發的，除了要求詩的自由性，認為詩不應該再受任何外來的拘束，為突顯個人感情或詮釋時代精神，應以最自然的方式使詩句呈現出來。詩人似乎已預知現代詩即將帶來的混亂與失序，對照他後來所發表的〈詩與哲理—瀛濤詩記 Aphorism 的詩〉一文所言：「今日新詩，於偏重此世紀繁雜多歧的人間現象，某些詩派為逐尖銳的現代化或前衛化，而竟走向棄本追末的窮途結果與詩本來的正道越趨背離，影響所及，遂導致詩的紛亂、疲憊、萎縮、墮落等世紀末的僵局狀態。<sup>10</sup>」可以發現，吳瀛濤對純粹性的要求，正是基於對原子時代之原子詩的一番認識。為表達現代的思想與感情，便須以現代的語言作詮釋，然而，原子的時代有其紛雜繁複的人間現象，欲以表達恰當的感覺並非易事，為避免複雜的外在因素破壞詩的本質，應追求詩的「純粹」與「自由」。這個主張與現代派信條第五條「追求詩的純粹性」的想法幾乎是重疊的，顯示「純

<sup>9</sup> 出處同前註。

<sup>10</sup> 吳瀛濤，〈詩與哲理—瀛濤詩記 Aphorism 的詩〉，《笠》詩刊第 24 期，1968.4

粹性」就當時時代而言，確有其提出之必要。同時，若對照當時台灣的政治環境，或許亦可發現這個主張隱含對抗現實，使之不受現實傷害，並嚮往現代詩獲得全面之自由的想法。

### 三、原子詩論提出的意義

#### (一)戰後現代詩論之濫觴

吳瀛濤的原子詩論在《現代詩》第三期就被刊登出來，早於現代派運動與該運動信條三年而登上文壇，主編紀弦也給予相當高度的肯定。可以推知，紀弦想要對台灣新詩有一番建設，所以對吳瀛濤所提出的難得的詩論，也是相當的肯定。然而，原子詩論似乎並沒有獲得足夠的彰顯，十分可惜。歸咎其中的原因，應與當時文壇的風氣與政治的環境有相當的關聯。回顧當時的台灣文壇，正是外省作家躍上文壇，領導文壇走向的時代。現代派以群體的方式集結龐大的勢力，無論各方面的條件(包含經濟面、政治面、文化面皆如此)，相較之下都比形單影隻的吳瀛濤所提出之「原子詩論」來得得天獨厚。縱然得到《現代詩》與《創世紀》主事者<sup>11</sup>的肯定，也分別在該詩刊發表不少詩作，然而，在文壇的發言位置仍不夠穩固，不足以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力，透露出省籍作家受到邊緣化的情形。做為一位跨越語言的詩人，吳瀛濤代表的是戰前文學與戰後文學聯繫的重要橋樑，他的「原子詩論」受到遮蔽的情形，正與五〇年代文學雙重斷裂的現象相互呼應。然而，吳瀛濤「原子詩論」的提出，根據前述定義與現代派信條的相互對照，會發現其中諸多相合之處，足以證明台灣文學中的現代主義血液之存在，只是因為時代的切斷，尚未找到鏈結的出口。此時，紀弦正好領導一場現代主義運動，居於底層的現代主義伏流漸漸浮上檯面，集結於這場運動，繼續鍛鑄現代主義美學，而吳瀛濤也跟上這個隊伍。至於「原子詩論」的內涵，便紛紛流入他的創作與詩觀中，以各種衍義的方式實現出來。

#### (二)現代主義的伏流

對於戰後現代主義文學的源流，陳千武曾提出「兩個球根說」。他指出：

一般認為促進直接性開花的根球是源流是紀弦從大陸帶來的戴望

---

<sup>11</sup> 紀弦與覃子豪皆曾為吳瀛濤的詩作寫序，並對他的文學成就投以高度的肯定及認同，這兩篇序後來因詩集沒有出版而未能面世，《笠》詩刊發行第一期的時候，吳瀛濤始將這兩篇序文重刊。

舒、李金髮所提倡的「現代派」。…。紀弦係屬於現代派的一員，而在台灣延續其現代的血緣，主編《現代詩》，成為台灣新詩的契機。另一個源流既是台灣過去在日本殖民的時代，透過曾受日本文壇影響下的矢野蜂人等所實踐的近代新詩精神，而繼承那些近代新詩的精神的少數詩人們：吳瀛濤、林亨泰，錦連等，跨越了日文中文的兩種語言，與紀弦從大陸背負過來的「現代派」球根融合，而形成了台灣詩壇現代詩的主流，證實了上述兩個根球合流的意義。<sup>12</sup>

若以這樣的看法加以檢視，很容易可以發現吳瀛濤所在的位置，也就是戰前的現代主義傳統。換言之，台灣的詩人，如吳瀛濤，他們並非在戰後才開始認識現代主義的，也不是一味接收移植的現代主義。現代主義對這一代的詩人來說並不陌生，不管是透過戰前留下來的傳統(如風車詩社的超現實主義)，或是詩人透過自修的方式<sup>13</sup>。儘管接收訊息的方式是受到政治環境的干擾而呈現零星的狀態，不可否認的是他所受到的現代主義之洗禮。戰後的政權扼殺作家與戰前傳統連結的網絡，阻止中國五四傳統與日治傳統在台灣著地，卻無法掩滅跨語一代詩人(如吳瀛濤)身上所背負的歷史記憶與文學養成。跨語一代的詩人，語言完成較快的、躲過政治制裁的，如吳瀛濤與林亨泰，就是代表過去的傳統，默默與戰後的現代主義詩接合，靠著現代派運動的掩護，將在地精神與傳統，以另一種保護色展現出來。這兩位省籍詩人之加入現代派運動，在文壇上的地位不容忽視。

總的來說，吳瀛濤所代表的，即是紀弦來台之前的現代主義傳統，揉和日治或戰爭期間，台灣文壇受到的現代主義精神之洗禮，當時曾在台灣流傳一時的由日本帶來的法國象徵主義，或戰爭由中國詩人帶來的中國現代派運動信息，都使吳瀛濤或多或少接收到現代主義的薰陶。無論他的詩作或是詩論，皆可為此提出證明。他的「原子詩論」正如貧瘠土地裡開出的奇異花朵，顯得特別突出。值得注意的是，這個詩論不僅是戰後台灣詩論的濫觴，同時也是戰後唯一由台灣本地創生的詩論。台灣的現代詩論多半自國外移植而來，原子詩論固然也是出自一位受到不同現代思潮薰陶的詩人，卻經由個人詮釋與創造而生，實屬可貴。他的詩論代表的是出自台灣本土的在地化現代主義，卻因政治的因素未受到應有的彰顯與重視，一直要到後來的長期耕耘，經由無數詩作的創造，透過發表於當時主要的詩刊，進行磨合與改造的工程，才使現代主義的在地化以完整的面貌呈現。

<sup>12</sup> 陳千武，〈台灣的現代詩〉，發表於《自立晚報》1980年9月2日。

<sup>13</sup> 以吳瀛濤為例，除了透過日文書籍得到現代主義文學的資訊，也曾親身接觸中國的現代派詩人代表，戰爭期間前往香港的經歷，使他不僅和戴望舒及其他詩人交換現代詩的意見，同時也帶回幾本中國當時現代詩的詩集

## 第二節 致力於笠詩社的耕耘

回顧戰後初期以至於五〇年代成立的詩社，主要由外省詩人主導，台灣本地的詩人受到嚴重的邊緣化。身為跨語一代的詩人，吳瀛濤很早就企圖建立本土的詩社，他曾試圖在一九五八年成立展望詩社，但實在因為詩社成立不易，還有很多現實面的考量，展望詩社後來並不算正式成立。一九六四年，一方面因為受到《台灣文藝》成立的刺激，一方面也因為聚集有志一同的詩人，集結起來的勢力較為龐大，笠詩社於焉成立。吳瀛濤在收集資料、整理史料的能力顯得特別突出，在在展現出跨語一代詩人獨有的文化資產與視野。他所收集的資料使過去受到隱蔽的日治時期文壇的歷史得以重見天日，有助於連結戰前與戰後的傳統。除此之外，他亦發表許多詩論與詩評，吳瀛濤在戰後之發表詩論始於一九五三年，往後大多零星的散布在各詩誌中，真正將想法集結起來，進行較有系統的發表，則是要到笠詩刊成立之後。笠詩社的成立，使吳瀛濤的對文學活動投入極大的心力，笠詩社成立之後的幾年，是詩人生命的最後階段。笠成立以後，對吳瀛濤的文學生命產生什麼變化？由於吳瀛濤的加入，對《笠》產生如何影響？相對的，擴大至整個詩壇以至於文學史，留下何種貢獻？正是本節所要討論的，期能藉此彰顯吳瀛濤在台灣文學發展過程中所在的位置及其成就所在。

### 一、回顧並重建文學史

做為跨語一代的詩人，吳瀛濤經歷的時代與跨越的歷史，要比戰後任何一代的詩人更為複雜而深刻。台灣文學歷經的變革與政體，都在他的生命中留下完整的記憶：總結日治文學成就的一九三〇年代後期、皇民文學如火如荼展開的四〇年代初期、反共文藝高揭的五〇年代、現代主義蓬勃發展的六〇年代。他的經歷，雖然突顯出台灣文學在不同時期所受到外來的傷害，卻也使他展現出超越於其他詩人的時代感。對於文學的熱愛與投入，使他長期搜集文壇的資料，關注文學發展的變化。台灣文學的前輩楊逵便指出<sup>14</sup>，收集日治文壇史料最多的，便是吳瀛濤。而他對於文獻整理與收集的用心，正是企圖建構一個屬於台灣本地文學史的展現。

吳瀛濤所寫下的文學史篇章雖然不多，然而，每一篇都代表一個完整文學史的呈現。他最早發表關於文學史回顧的篇章，是在一九五四年，發表於《台北文物》「新文學運動專號」上的〈台灣新文學的第一階段〉<sup>15</sup>及〈台灣新文學運動

<sup>14</sup> 參閱痲弦，〈詩人的歷史感—寫在張默編「台灣現代詩編目」卷前〉，收入張默，《現代詩編目（1949-1995）》，頁數 12。

<sup>15</sup> 吳瀛濤，〈台灣新文學的第一階段〉，《台北文物》，3：2，1954年8月。



的第二階段)<sup>16</sup>。笠詩社成立以後，在前述兩篇的基礎上，完成並發表〈台灣新詩的回顧(一)〉<sup>17</sup>與〈台灣新詩的回顧(二)〉<sup>18</sup>。這兩個篇章所展現出來的，是相當全面而完整的觀照，對於文學現象、文學活動的產生、文學雜誌的刊行，都有十分詳細的記錄，戰後因政治的封閉，使日治的台灣文學呈現一片破碎的片段。吳瀛濤這一部文學的完成，不僅使戰後一代的詩人對過去的傳統有所認識，同時，亦使斷裂的傳統出現連結的橋樑。值得注意的是，關於文學史的整理，吳瀛濤應是戰後最早的一位，距離李南衡於一九七九年編定的《日據下台灣新文學——詩選集》<sup>19</sup>及羊子喬和陳千武在一九八二年編選的《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sup>20</sup>以前十年，吳瀛濤已將台灣文學及詩史的輪廓建立起來。而這兩篇新詩史的回顧在《笠》詩刊的發表，更暗示著《笠》在戰前與戰後傳統的繫連之間的重要使命。

除了詩史的建構與還原，吳瀛濤對於建立文學史的焦慮，也使他展開與東亞文學的結盟，將台灣文學置於世界文學作觀照。《笠》發行第4期時，吳瀛濤便發表〈日本現代詩史〉<sup>21</sup>，爾後更陸續發表〈中日現代詩的交流〉<sup>22</sup>、〈日本詩展望(一)〉<sup>23</sup>、〈日本詩展望(二)〉<sup>24</sup>等作品，再對照他在《今日之中國》<sup>25</sup>發表翻譯的小說，除了突顯詩人優異的語言能力，值得注意的是，他所展開的跨語一代詩人的能動。他的努力，使貧乏的台灣詩壇，獲得更多滋養。由日文出發，乃由於他身為跨語詩人使然。透過如此巧妙的連結，台灣詩壇在東亞的結盟下，晉身世界文學之林，藉此擺脫過去受到邊緣化的處境。

## 二、詩評的建立

有感於戰後詩壇陷於一片混亂，吳瀛濤曾寫作多篇文章，為當時渾沌不明的詩壇提出建言。從他所發表的詩作，大略可以發現當時文壇的問題。他所提出的論點皆極具力道，頗能反映出當時現代詩發展過程中所遭遇的陷阱與困難，亦足以對詩壇提出一當頭棒喝。

<sup>16</sup> 吳瀛濤，〈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第二階段〉，《台北文物》，3：3，1954年12月。

<sup>17</sup> 吳瀛濤，〈台灣新詩的回顧(一)〉，《笠》第33期，1969年10月。

<sup>18</sup> 吳瀛濤，〈台灣新詩的回顧(二)〉，《笠》第35期，1970年2月。

<sup>19</sup> 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詩選集》，台北：明潭，1979。

<sup>20</sup> 羊子喬、陳千武編，《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台北：遠景，1982。

<sup>21</sup> 《笠》第4期，1954年12月。

<sup>22</sup> 吳瀛濤譯，《笠》第12期，1966年4月。

<sup>23</sup> 《笠》第25期，1968年6月。

<sup>24</sup> 《笠》第26期，1968年8月。

<sup>25</sup> 「今日之中國」是一份月刊，一九六三年六月創刊，到一九七二年六月，共發行十年，以「今日之中國社」名義刊行，未標舉實際負責人。」，吳瀛濤在該刊發表翻譯小說，將中國著名小說譯為日文，也發表俚俗文章(亦以日文寫成)。

## (一) 矯正晦澀詩風

他首先對「新詩」與「現代詩」之定義作出比較與釐清，將兩者置於詩歌發展的脈絡中作一考察，認為當前的詩應稱作現代詩，因為它較新詩更能詮釋現代環境中所產生的新詩。恐怕也可以由此發言看出當時詩壇對於詩的追求，沒有能夠也沒有能力作出專業精熟的要求。再者，從他的詩論中，也強烈地投射出當時詩壇對於現代詩與「難懂的詩」相互混淆的憂心與危機。他指出現代詩陷於孤立的處境，要與詩難解、晦澀所形成的混亂局面有密切的關聯，這也是阻礙現代詩前行的重要因素。因此，他認為「現代詩」，應該走向「易懂」、「易讀」的方向。他的文章中除了對現代詩之所以難懂進行內在與外在層層的分析，提出解決的要領。同時，他也積極提出其他對於現代詩發展的幾個重要原則與信條。

他指出：「這是比任何時代還要要求「詩的真實性」的時代。」<sup>26</sup>現代雖處於混亂，不同與以往，然而，詩人正要從混亂中去發現人類的新的真實與真理，不應該被戰後的虛無和混亂扼殺。他認為：詩的問題不僅限於詩本身的藝術表現，而已擴展到更進一步的人間之探求：「詩人應對詩負起人間責任，對世界負起詩人使命。此並非以詩限於某一主體的附隸而迫之空洞，相反地因他對人間堅強負責，騎師的展開當為最具實質而切實的問題之提現。」其中一篇於作者編輯《台灣文藝》新詩欄有所感而提出，特別具有意義。他特闢「詩的表達」與「詩的實質」兩段，文中寫道：「如果急於虛其外表的現代化，則其寫出來的，不過是不東不西而未成熟的，甚至是無病呻吟的，故弄玄虛的，似詩非詩的作品。」針對台灣詩壇發展現況中的弊端再次提出宣告，並呼籲詩人重視詩的本質。

## (二) 建構理論基礎

誠如吳瀛濤所言：「新時代應有新時代的詩，而新時代的詩應有新時代的詩論。」當時他率先提出的原子詩論，可以說對台灣現代詩的發展提出了重要的預示與建言。然而，他的先知與先行，恐怕是許多人所不曾發現的。他對原子詩論的專研極深，除了陸續發表原子詩論的相關文章，亦創作〈原子之夢〉等詩作。同時，他亦寫作數篇討論現代詩理論之專文，及實用性的「現代詩用語辭典」。這些作品，後來都在一九六四年《笠》發行以後，集結登載於該誌。這段耕耘的旅程，從一九五三年直到一九七一年吳瀛濤去世前，台灣現代詩經過發展初期的琢磨、各派論戰的討論、不同潮流的消長、一直到後來慢慢成熟，並且看到幾個主要方向的确立，都留下吳瀛濤默默努力的足跡和不可分割的關聯。他的詩論，

<sup>26</sup> 吳瀛濤，〈詩與哲學——論詩的真實性〉，《笠》第9期，1965.8。

反應了台灣現代詩在發展過程中的徬徨與困境、身爲一位本地詩人對現代詩何去何從感到的無限焦慮、台灣現代詩理論的體質。〈現代詩用語辭典〉(一)至(九)的完成，便是將焦慮付諸實踐的成果。對於詩論基礎的建立，是他晚年最爲迫切且用力最深的。

台灣現代詩的體質本有先天上的不足，發展起來自然也較易遭遇諸多困頓。如同吳瀛濤所言：「今日我們的詩壇甚缺詩論的依據，也乏詩學良好的基礎教育。這使本來繁雜多歧的現代詩，在此時此地更呈紛亂而未予以處理的弊病。」政治的環境、外在與內在的失衡、移植的傳統等種種的問題，都使台灣的現代詩發展起來格外辛苦，要在其中在開啓詩論的萌芽更顯艱難。吳瀛濤在這其中擔任了重要的角色，他的詩論使混亂的現代詩壇不致於更加混亂，使台灣現代詩的路途即使晦澀不明但不致找不到方向。如同他所提出的原子詩論之真義，將破壞力反轉爲前進的動力：「真正的詩人不因工業社會的喧嘩紊亂而失去其寧靜統一，他不僅將之吸收消化，且要克服之、抵禦之、棄揚之，使之有助於詩本身，人間本身，此正如原子的破壞力將應有助於人間的建設一般。」。他所在的位置，足以爲台灣現代詩的發展提出解釋。他的箴言，先於眾人而提出，暗示詩壇將遭遇的困境，也爲受盡折磨的現代詩留下掙扎的痕跡。閱讀他的詩評與詩論，不能輕易視其中的苦心與期待。

正當台灣文學逐漸發展起來的同時，吳瀛濤仍保持著積極的監督角色，以感性的詩思塑造藝術的詩，同時未曾忘記以客觀理性的視角介入現代詩發展的軌跡。即使到了晚年爲病所苦，仍繼續堅守著他的位置。一九七〇年，正值笠詩社成立第七年，他寫下〈詩的孤城〉<sup>27</sup>。文中除了明示「詩素」的重要，強調它不應該和詩一起，長久被遺忘在外。也透露了一路以來堅持信念、默默耕耘的孤寂感與無力感，以及台灣現代詩發展過程中遭遇的重重障礙與再建之不易。然而，正如同本篇文章所說：「《笠》要作的事很多，那也是我們詩壇共同要作的事。」；「無論如何堅守這一座人類精神的堡壘，才是我們存在的理由。」吳瀛濤所堅守的位置將隨同《笠》而保留下來，他對台灣現代詩深刻的期望關懷，與不爲潮流輕易擺盪的堅持努力，將使他的位置恆久存在。

---

<sup>27</sup> 發表於《笠》第37期，1970.6。